

第三節、破壞渝方組織與暗殺謝晉元

重慶派在京滬地區的特務組織眾多，包括「軍統」及「中統」、上海市黨部、江蘇省黨部、三青團上海支團部、第三戰區駐滬辦事處等，汪方對這些組織都頗為清楚，搜索嚴厲，尤其在汪政府成立前決定肅清渝方在上海的特務組織¹。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朱家驊曾電吳開先及蔣伯誠，朱要他們注意汪日方面已經掌握渝方在上海的所有地下組織，並將其列為查緝目標²。在雙方交手中汪方「七十六號」與「軍統」、市黨部的鬥爭最為激烈，「七十六號」首領李士群曾在汪政府會議上高呼「左手消滅藍衣社，右手打倒 CC」³。其中「藍衣社」指的是戴笠領導的「軍統」，「CC」指的是市黨部及「中統」，故渝方的地下組織都會多次遭受嚴重破壞，其領導人非死即降，幸運一點的則被釋放。渝方上海市黨部委員張小通、第三戰區駐滬代表平祖仁等被捉後都遭處死的命運，江蘇省黨部主委馬元放及繼任者葛建時被捉後經各方營救幸運被釋放。

「軍統」的處境也好不到那裡，其南京區長錢新民及副區長都雙雙被捕，錢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晨六點被「七十六號」處死，尙亦於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九日與第三戰區督察專員平祖仁一同被槍殺於中山路刑場⁴。此外「軍統」最大的外勤組織上海區也多次被破壞又重建，「七十六號」陸續逮捕其區長王天木及陳恭澍，二人最後被「七十六號」所吸收並投靠李士群，使得「軍統」在上海的特務工作遭受最嚴重的打擊，也種下了戴笠對李士群更深的仇恨。就在王天木投汪的同時戴笠又成立上海二區，簡稱「滬二區」，由於成立較晚故在戰爭末期才被破壞，然而因為「滬二區」已成功安置人員在陳公博身邊，最後雖被破獲但靠著陳公博的掩護，區長陳祖康及其他人員才得以保全。不僅如此，渝方在上海所有組織及人員事實上都成為汪方的眼中釘，汪方對他們是非降即剷除之，所以對於退守租界的「四行孤軍」這支渝方軍隊，汪方也絕不放過，於是先實施威脅利誘進行拉攏，但由於孤軍團團長謝晉元尙與重慶密切聯繫，謝不僅不屈服還發表批汪言論，最後汪方索性派人將其暗殺。

一、黨部蒙難、主委被執

抗戰爆發後，江蘇省政府淪落至蘇北游擊，先自淮陰遷興化，再從興化遷東安、安豐等處，省府官員常來往上海與蘇北地區，省黨部主委馬元放也來到上海，

¹ 〈孫步樺電朱家驊轉總裁—民國 29 年 1 月 29 日〉，《朱家驊檔案》，第七十八函：京滬情報。

² 〈朱家驊電吳開先—民國 29 年 2 月 28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上海黨務 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³ 羅君強原作，〈細說汪偽(上)〉，《傳記文學》，第 62 卷第 1 期，民國 82 年 1 月，頁 95。

⁴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5 年 7 月 31 日初版)，頁 92，107。

馬至上海後與其同學掌牧民組織了「抗戰建國協會」，並邀蘇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葛覃，江蘇農民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吳任滄，蘇省黨部委員石順淵、崔步武及上海各大學教授、學生加入，推掌牧民為會長，該協會從此積極支援抗日游擊活動⁵，但其實民國二十九年秋天汪方「七十六號」李士群已買通江蘇省黨部一個內線，汪方已掌握馬元放等蘇省黨部人員的活動⁶。

馬元放為江蘇常州人，曾任國民政府南京市社會局科長，江蘇省黨部委員，中央宣傳部秘書，江蘇省第七行政區督察專員，江蘇省政府委員，中央宣傳部秘書，民國二十八年十月起被任命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⁷。七月「抗建協會」馬元放等人在公共租界跑馬廳虞洽卿路東方飯店開會，不料為「七十六號」所偵悉，李士群會同租界巡捕及日本憲兵前往逮捕，總計被捕的有蘇省黨部主任委員馬元放及委員石順淵、崔步武，抗建協會會長掌牧民等⁸。七月十五日汪方將馬元放押至南京拘禁於「警察廳刑務所」，獲知消息的重慶組織部立刻命令上海市黨部設法營救，七月二十四日組織部長朱家驊要上海市黨部人員設法潛往探視並帶去朱之慰問⁹。七月十九日陳果夫代馬元放之妻請求朱家驊資助金錢協助其前往上海處理該事¹⁰。八月馬元放由汪方「首都警察廳」託人遞出一封信於渝方人員，該信稱：

於七月十五日來京，忽又多日矣，此次事件在現時對內工作原在意料之中，惟為熟友所賺，則不能不謂出乎意料之外，弟稍讀聖賢書，當知所以自處之道，嗣於外傳種種，乞勿輕信。乞轉達井先生轉告天他先生釋念為幸，敝眷聞想回來，弟意仍以不動為宜，請兄便為一勸，並希隨時照拂為感¹¹。

馬函提到自己是被熟人所害，並希望重慶方面勸告其家人不要到上海來。九月底陳果夫將馬元放遞出之函送給朱家驊並且告訴他，據消息馬元放並未變節投

⁵ 朱彬，〈孤島孤軍血淚流—掌牧民馬元放與上海抗建協會〉，《中外雜誌》，第 32 卷第 3 期，民國 71 年 9 月號，頁 117。

⁶ 馬嘯天、汪曼雲遺稿，黃美真整理，《汪偽特工內幕》，（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頁 66。

⁷ 黃美真，姜義華，石源華，《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2 月第一版），頁 96。

⁸ 朱彬，〈孤島孤軍血淚流—掌牧民馬元放與上海抗建協會〉，《中外雜誌》，第 32 卷第 3 期，民國 71 年 9 月號，頁 118。

⁹ 〈趙祺電朱家驊—民國 29 年 7 月 24 日〉，《朱家驊檔案》，第三十七函：黨工人員被捕及獲救脫險（馬元放等）。

¹⁰ 〈陳果夫函朱家驊—民國 29 年 7 月 19 日〉，《朱家驊檔案》，第三十七函：黨工人員被捕及獲救脫險（馬元放等）。

¹¹ 〈馬元放自偽首都警察廳致士選兄—民國 29 年 8 月 8 日〉，《朱家驊檔案》，第三十七函：黨工人員被捕及獲救脫險（馬元放等）。收信人為「士選」為渝方某人，「井先生」及「天他」或為暗語，或指朱家驊等人。該函後由陳果夫轉送朱家驊。

汪，馬之家眷有六口，全賴馬之薪給以資贍養，陳認為馬若未變節，則朱應對其家屬給予救助¹²。於是朱家驊同意照撥馬原省黨部主委薪津以資救濟¹³。

後來馬元放又被押往南京區看守所，民國三十年十月十一日因痔疾大發，於是在周佛海援救之下，馬元放獲得保外就醫¹⁴，掌牧民等人亦獲得保釋。此後馬等人雖未被拘禁但僅能於南京城內活動，馬遂一人獨居南京舊市區一幢舊式大宅¹⁵。民國三十二年馬終於獲准離開南京，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馬元放往見周佛海，馬稱其擬往內地，詢問周之意見，周同意並資助其旅費¹⁶。抗戰勝利後馬擔任南京副市長，大陸淪陷後馬留在大陸並未來台¹⁷。

馬元放被捕一個月後，國民黨組織部又遭逢一次頗大的損失，那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上海支團部人員的變節。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吳紹澍函國民黨組織部，稱上海三青團支團部書記長奚培文，組訓組長呂哲，情報組長姜夢麟，總務組長王果為，行動隊長張樹椿等，攜帶該團全部團員名冊照片以及文件、無線電台收發機等投汪¹⁸。奚培文與呂哲均係「復興社」份子，與陳誠、康澤之關係甚深，奚年二十七歲，江蘇人，留日學生，工作訓練班及中央黨政訓練班畢業，在日本留學時曾任留日復興社書記，呂哲年三十二歲，安徽人，黃埔軍校第七期畢業，曾任滬黃埔同學會調查科主任，兼復興社上海分社第四支社書記。

事實上呂、奚等人投汪內情並不單純，除了汪方的威脅利誘外，重慶方面黨部與「三青團」的內部鬥爭亦是原因之一。「軍統」與「中統」向來不合，戴笠曾由其上海特工人員偵悉其內情並向蔣中正報告，該報告稱奚培文及呂哲乃於八月二十四日投汪，因為自從「三青團上海支團部」主任吳紹澍離滬後，職務暫由奚培文代理，奚培文與組訓組長呂哲由汪方特工馬嘯天手中得到國幣二十五萬元，二人於八月二十四日附汪，同日總務組長王果為、情報組長姜夢麟也被二人誘捕至「七十六號」，該團所有文件，如入團宣誓表、登記表、介紹表、團員總

¹² 〈陳果夫函朱家驊—民國 29 年 9 月 28 日〉，《朱家驊檔案》，第三十七函：黨工人員被捕及獲救脫險(馬元放等)。

¹³ 〈陳委員果夫函朱家驊—民國 29 年 10 月 1 日〉，《朱家驊檔案》，第三十七函：黨工人員被捕及獲救脫險(馬元放等)。

¹⁴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1)—馬元放為被捕得周佛海援救致首都高等法院函(1946 年 10 月 1 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 月第一版)，頁 141。

¹⁵ 朱彬，〈孤島孤軍血淚流—掌牧民馬元放與上海抗建協會〉，《中外雜誌》，第 32 卷第 3 期，民國 71 年 9 月號，頁 119。

¹⁶ 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910。

¹⁷ 朱彬，〈孤島孤軍血淚流—掌牧民馬元放與上海抗建協會〉，《中外雜誌》，第 32 卷第 3 期，民國 71 年 9 月號，頁 119。

¹⁸ 〈吳紹澍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民國 29 年 9 月 19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京滬附逆。

名冊等於八月二十六日均被呂哲帶走，該團於公共租界之電台亦被奚培文派人同王果為前往拆毀。至於為何奚呂會叛變？戴笠稱二人平日嗜賭，且做金子之投機交易，虧累甚鉅，故出此下策，至於二人何以要出賣團體？因為「三青團」政治部主任陳誠受「二陳」陳果夫及陳立夫之排擠而辭職，「二陳」對上海支團部歧視甚深，不允擴充，在上海的吳開先亦不支持該團，黨與團的摩擦越來越深。大概在「三青團」受各方掣肘下，出於對其無信心二人才出此下策，而奚、呂投汪後除得到國幣二十五萬元外，又得到蘇浙皖區廳長及少將司令等職，二人又向汪方提出如下要求：(一)反共不反蔣(二)對原有各級幹部不加殘害(三)得享有思想行動之自由¹⁹。

由於三青團上海支團部主要領導人的投汪，上海全部三青團員的名單被「七十六號」所掌握，並公佈於汪方的中華日報，李士群且以警政部名義頒發「三青團員自首辦法條例」，上海支團部的毀滅算是李士群與「七十六號」的一大勝利²⁰，然而若戴笠所言屬實，則這次淪方的損失部分原因實導因於其內部之權利鬥爭。然而淪方國民黨組織部的麻煩尚不僅只於此，因為接下來就是馬元放的後任者葛建時的被捕。

馬元放於民國二十九年六月被捕後，九月朱家驊隨即發表由葛建時代理江蘇省黨部主委職務²¹。葛建時，江蘇寶山人，民國前十二年生，日本明治大學畢業，重慶「中訓團黨政班」第三期畢業，曾任江蘇省政府秘書長、中央組織部設計委員、中央日報社編輯、抗戰時任中央軍校第三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官階少將，江蘇省黨部代主任委員，江蘇省政府委員²²。

民國三十一年夏天朱家驊命令江蘇省黨部北遷，但葛建時竟在北遷途中被汪方劫持²³，當時葛建時化名張子年欲渡過長江，隨行者尚有省黨部幹事，鎮江縣黨部書記長，他們乘民船至甕橋轉乘金壇輪船北行，不料被汪軍尹君華查獲，尹將之扣留於洙泗村汪軍司令部呂順林處，旋由日警土山隊長勸其參加和運，葛表示反對，誓死不屈，葛且自被捕後絕食四天²⁴。接獲消息的重慶國民黨中央組織

¹⁹ 〈戴笠報告—民國 29 年 9 月 17 日〉國史館檔案 特交檔案 軍事:特種情報 光碟編號 08A-00493(002-080102-037-001)。

²⁰ 黃美真，姜義華，石源華，《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2 月第一版)，頁，頁 98。

²¹ 〈朱家驊致張道藩—民國 29 年 9 月 15 日〉，《朱家驊檔案》，第三十七函：黨工人員被捕及獲救脫險(馬元放等)。

²² 國史館檔案 侍從室檔 檔號 1000097814 葛建時。

²³ 〈蘇省黨委沈立人向朱家驊報告在蘇兩年工作要點及陷區敵偽奸匪情形—民國 31 年 7 月 3 日〉，《朱家驊檔案》，第三十七函：敵情及匪情。

²⁴ 〈冷欣於寧國電吳鐵城—民國 31 年 9 月 9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類 030 號 540。

部下令各方營救及撫慰家屬。十月九日早晨，汪方派八十名士兵將其押解南京，汪方並脅迫其參加和運，葛痛加斥責，謂欲求東亞真正和平，惟有中國抗戰勝利方能實現²⁵。後來在周佛海的保釋下，葛被拘不到一年即被釋放²⁶。

二、區長變節、滬區瓦解

除了組織部之外，汪方也屢次破壞「軍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軍統」上海區前後任區長有多人被捕後變節投汪，上海區是「軍統」所屬的最大一個地區單位，全體員額在一千人上下，民國二十七年間周偉龍擔任區長，該年冬天，因為一外勤人員被捕之牽連，區辦事處遭到法捕房之搜捕，搜出了槍枝、密電碼和一些文件，區長周偉龍也遭到法捕房的逮捕，後來戴笠請重慶一位部長與法國當局交涉，使周偉龍以驅逐出境方式獲得安全脫險，回到重慶，周偉龍離開上海後，戴笠改派王天木為區長，王為保定軍校及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很早即追隨戴笠搞情報活動，彼此交情深厚，但王天木接任上海區後大幅度調整人事，引起內部糾紛，最後戴笠免去了王天木上海區長之職²⁷，王免職後由趙理君代理區長職務。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汪精衛來到上海，「七十六號」成立後，李士群掌握到王天木之行蹤，並派人跟蹤其整整一個月，某日終於在一個茶館捕捉到王天木²⁸，王天木被捕後不久遂與原上海區助理書記陳第容及「忠義救國軍」支隊長何天風一起變節投汪。

民國二十八年，曾參加河內刺汪的王魯翹奉戴笠之命追蹤汪精衛至上海，七月十四日王天木邀約王魯翹至寓所會談，王魯翹不知王天木已投汪，乃欣然赴約，沒想到中途遭日本憲兵便衣隊五人攔截，企圖強行綁架方式，由法租界密解出去，王與之搏擊週旋並呼救，後來被法捕房華籍警探發覺，警探將王與日便衣五人帶至法捕房，日方要求引渡被法方拒絕，但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王魯翹被捕後，先前隨王天木變節的上海區助理書記陳第容將上海區全部組織名稱與住址、人員名單，提供日本憲兵隊，於是日憲會同兩租界捕房，搜查上海區人員住所及辦公地址達十四處之多，幸賴上海區佈置於法捕房之內線劉俊卿向區書記鄭修元通風報信，才使上海區未被一網打盡，而能遷移地址，照常工作²⁹。王天木雖對

²⁵ 〈馮有真屯溪電蕭社長轉王部長朱部長吳秘書長—民國 31 年 10 月 31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類 29 號 6.6。

²⁶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1)—馬元放為被捕得周佛海援救致首都高等法院函(1946 年 10 月 1 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 月第一版)，頁 141。

²⁷ 陳恭澍，《上海抗日敵後行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3 年 10 月 1 日初版)，頁 8-15。

²⁸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 55 年)，頁 102。

²⁹ 費雲文編纂，《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台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 68 年 10 月初版)，頁 106。

上海區倒打一耙，但戴笠並未放棄王天木，爲了挽回已投汪的王天木，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初河內刺汪案的指揮者陳恭澍奉戴笠之命來到上海，八月十二日陳接到戴笠來電，戴笠命陳接任上海區長，陳至上海後適面臨王天木、陳第容、何天風等人叛變投汪，本來陳恭澍是奉命來勸王天木回頭，但形勢已不可能。王等人叛變後上海區遭致大搜查，於是陳只得將各機關一一遷移地址。

此後在陳恭澍擔任上海區長期間，就與汪方「七十六號」展開了血腥的鬥爭，他們執行了多起制裁案，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法捕房政治部華籍督察長程海壽被上海區槍殺，程曾於七月十五日王魯翹被法租界捕房逮捕後，帶著日本憲兵搜查上海區十四個辦公地點，上海區多次警告不聽，於是執行制裁³⁰。同一時間戴笠再派一吳姓情報員至上海擬說服王天木及其三位手下馬河圖、岳清江、丁寶齡歸隊。後來馬河圖等三人同意歸隊，三人爲表示誠意，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三點在滬西愚園路惠爾登舞廳門前，將隨汪天木投汪的陳第容、何行健二人槍殺，爲「軍統」清除門戶。二人被殺後「七十六號」爲了報復，竟在牢中將已被捕之上海區人員周錫良、徐壽新、余延智三人提出槍斃³¹。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區」第二行動大隊又槍殺了投日的上海商人俞葉封³²。同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區再制裁附日的聞人張嘯林，十月十二日制裁上海市長傅筱庵，十二月十七日再將法租界公董局政務督辦法人杜洛擊斃，因其是將法租界中國法院交給汪政府的主要人物³³。

不久陳恭澍請示上級，取得渝方批准上海區可攻擊日本軍官，於是自民國二十九年九月間開始，至三十年十月下旬上海區前後擊斃日軍約五十餘件，日軍死傷在六十名以上³⁴。民國三十年一月汪政府「中央儲備銀行」開幕，上海區奉命制裁「中儲」行員，其中該行上海分行會計主任張永綱及稽核厲鼎模都是被上海區所殺³⁵。前文曾提到當初奉戴笠命刺殺汪精衛的陳三才因白俄告密被「七十六號」所捕，最後被汪下令處死，民國三十年九月十八日上海區「新一組」將該名出賣陳三才之白俄伊凡諾夫擊斃，爲陳報仇³⁶。總計陳恭澍由民國二十八年八月擔任上海區長兩年以來，上海區共制裁汪方人員一百餘名，格殺日本武裝官兵六

³⁰ 陳恭澍，《上海抗日敵後行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3年10月1日初版)，頁56。

³¹ 《上海抗日敵後行動》，頁134，256。

³² 《上海抗日敵後行動》，頁121。

³³ 《上海抗日敵後行動》，頁319，364，380。

³⁴ 《上海抗日敵後行動》，頁275-276。

³⁵ 《上海抗日敵後行動》，頁386。

³⁶ 《上海抗日敵後行動》，頁109。

十餘人，另外破壞日方軍事設施、焚燬軍需物資五十餘件次³⁷。上海區的這些豐功偉績應該令戴笠很滿意吧！然而面對軍統上海區的血腥攻勢，汪日方面時刻都想剷除之，自民國三十年初開始，汪方「特工總部七十六號」所屬的第一處與上海日本憲兵隊所屬之「特高課」兩相配合下，專門對上海區展開了地毯式的搜查及逮捕。

民國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惡夢終於降臨上海區頭上，當天晚上十一點多陳恭澍接到公共租界捕房內線劉俊卿連續好幾通的警告電話，上海日本憲兵隊和「七十六號」已知會捕房，準備當夜大舉捉人，原來區會計陳榮賢已在家裡被捕，賬單被搜出好幾箱，於是陳恭澍冒險出門至新聞路，因該地有一與重慶直接通報之電台，陳向戴笠電告上海區所面臨的危機。打完電報後陳再奔助理書記齊慶彬住處，擬與齊商量應付辦法，沒想到齊慶彬亦已被捕，日本人在齊家守株待兔，陳不查於是也在齊家被捕，這一晚是陳恭澍最漫長的一夜，亦是「軍統」最慘重的一次損失，因為上海區整個被破獲³⁸，共有一百多人被捕，文件成捆被搜出，要命的是區長陳恭澍亦被執，「軍統」最大的外勤單位已整個瓦解³⁹。收到上海區被毀的消息，戴笠異常悲憤，戴笠對著才由上海回來的余祥琴說一定要報仇，說的時候還熱淚盈眶⁴⁰。上海區的瓦解確實對戴笠打擊甚大，戴笠甚至還因此被他們的「委座」蔣中正罵了一頓⁴¹。

然而陳恭澍被捕後並未被槍決，汪方想要陳投降並利用之，於是在「七十六號」的牢裡向陳進行勸說，此外還捏造陳之名義在報端發表其聲明「響應和平運動，擁護南京政府」等話語，「珍珠港事變」後李士群還在其報紙「國民新聞」上連載由陳恭澍執筆之《藍衣社內幕》一書⁴²，該書將「軍統」各制裁案完全洩底，影響重慶及「軍統」聲譽甚大。不久，陳決定保留有用之身在汪政府內部進行「反間」，於是陳決定投入汪政府進行所謂「翻本」⁴³，陳被釋放後先擔任汪

³⁷ 陳恭澍，《上海抗日敵後行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3 年 10 月 1 日初版)，頁 348。

³⁸ 周佛海民國 30 年 10 月 31 日曾記載：「李士群來，報告破獲藍衣社上海區經過。」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600。「藍衣社」指「軍統」。

³⁹ 《上海抗日敵後行動》，頁 431-443。

⁴⁰ 余祥琴遺著，閔夢塵編校，〈上海淪陷期間四年地下工作追記(上)〉，《傳記文學》，第 33 卷第 2 期，民國 67 年 8 月號，頁 47。

⁴¹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87 年 3 月 24 日初版)，頁 216。唐縱原為軍統人員，後進入「侍從室」工作，是戴笠與蔣中正溝通的管道之一。

⁴² 陳恭澍一直否認該書為其所寫，羅君強則曾提到該書其實是投汪的另一「上海區長」王天木捉刀。羅君強原作，〈細說汪偽(中)〉，《傳記文學》，第 62 卷第 2 期，民國 82 年 2 月號，頁 78。

⁴³ 按唐縱的說法，陳恭澍乃因在上海狂嫖爛賭，虧數萬元，遭戴笠派人查其賬，再加上陳向某廠商敲詐四十萬元被「戴老闆」知道，於是陳乃乾脆投汪，此說完全與陳本人說法不同。見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87 年 3 月 24 日初版)，頁 236。

方政治保衛學校教育長，後再被派為「蘇浙皖贛四省行營總指揮部」副總指揮⁴⁴。此後陳恭澍跟隨李士群，成為李之手下，民國三十二年九月李士群死後，日本「梅機關」為陳恭澍設立了「第一委員會」，陳被命為負責人，受「梅機關」中島信一的支持，為「梅機關」搜集情報⁴⁵。陳恭澍投汪後一度令戴笠非常不滿，民國三十二年秋季戴笠下令上海的軍統人員制裁陳恭澍，後經齊慶彬、余祥琴等向戴笠說情後陳恭澍才免去一死⁴⁶。民國三十二年十月，陳恭澍終於託人與江西的軍統局東南辦事處主任毛萬里聯絡上，陳暗地裡與軍統電報往來，一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七月某天日方已發現陳與軍統恢復關係，當日夜裡陳乃逃離「第一委員會」，後來靠著投汪的原來軍校同學之協助，陳逃往渝方游擊隊「忠義救國軍」陳默的部隊，算是歸隊到了渝方。然而抗戰勝利後，陳由於曾投入汪政府，被判處十二年徒刑，但最後只服刑一年五個多月就為國民黨的剿共戰爭而被徵召赴前線，大陸淪陷後陳恭澍追隨國府遷台⁴⁷。

其實「軍統」在上海的勢力不單只有一個上海區。早在民國二十八年七月「軍統」上海區王天木、陳第容等人叛變投汪，軍統上海區大遭破壞後，戴笠鑒於「軍統」之高級幹部，或為汪方所認識，或與上海有地緣關係，身份皆難以長期掩護，乃以新面目，在黨政學各界有相當地位，在重慶原任特區區長之姜紹謨，擔任軍統「上海二區區長」，於是軍統成立了「滬二區」，該區專以汪政權為對象，以情報、策反為工作範圍⁴⁸。姜紹謨，浙江江山縣人，他是戴笠的小學同學，北京大學畢業，北伐時曾擔任國民革命軍東路指揮部少將參議，浙江省黨部委員，省立法政專校校長，以及教育部司長等職，抗戰爆發後才開始加入「軍統」，在重慶局本部工作，後來因「軍統」上海工作之挫折，乃答應戴笠至上海建立新的組織。姜本無從事地下活動的經驗，但至上海後就收買到了汪政府財政部錢幣司長梅哲之和文官長徐天深，從汪政府搜集到各種情報，姜還利用汪政府海軍部長任援道的弟弟任西萍的關係，秘密策反任援道，使得任答應待國軍反攻一定率部反正。此外「滬二區」還打入日軍特務機關及「登部隊」，成功吸收其打字員及譯電員，曾有一次「滬二區」得到日軍將空襲重慶「軍統」局本部的情報，於是「滬二區」

⁴⁴ 《抗戰後期反間活動》，頁 268。

⁴⁵ 《抗戰後期反間活動》，頁 389-394。

⁴⁶ 余祥琴遺著，閔夢塵編校，〈上海淪陷期間四年地下工作追記(中)〉，《傳記文學》，第 33 卷第 2 期，民國 67 年 8 月號，頁 87。作者原被戴笠派至上海策反李士群，不料碰到上海區被破獲。

⁴⁷ 《抗戰後期反間活動》，頁 572。

⁴⁸ 費雲文編纂，《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台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 68 年 10 月初版)，頁 730。

將之通知重慶，使得軍統人員得以事先疏散，未蒙損失⁴⁹。

民國三十年底「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滬二區」區長姜紹謨被調回重慶，由助理書記陳祖康繼任區長⁵⁰，陳祖康為福建漳平縣人，民國前八年出生，民國五年進入福建省立第九中學就讀，後來由漳平縣政府選送赴法國留學，民國十一年夏陳考進「西方工學院」及「烏靈大學」取得土木工程師證書與碩士學位⁵¹。民國十五年陳辭去「西方工學院」助教職務由法國回到上海轉赴廣州至黃埔軍校擔任政治教官⁵²，民國二十八年陳加入「軍統」並奉派至滬二區工作。

早在民國二十七年冬汪精衛發表豔電後，渝方即斷定其必投敵於是即安排陳公博的朋友徐天深靠近陳公博以為將來之內線，果然汪政府成立後，陳公博被任為上海市長，徐天深即被任為經濟局長，汪精衛死後陳公博任汪政府代理主席，徐又被任為文官長，當時由「滬二區」與徐聯絡，渝方還透過「滬二區」付給徐天深薪俸。「滬二區」除利用徐天深這條內線外，還收買了上海日本陸軍特務機關囑託(顧問)王丙鏞，他曾是陳祖康的同學，兩人交情形同莫逆。當時王丙鏞成立一個「浙東學會」，發行浙東日報，經費由日本陸軍特務機關供應，於是「浙東學會」竟成為「滬二區」對外圍的聯絡處所，「滬二區」甚至曾利用「浙東學會」與日方的關係，使用日本特務機關的汽車送「滬二區」前任區長姜紹謨離開上海返回重慶，且透過「浙東學會」的推薦，由日方強迫汪政府任用「滬二區」人員為浙東行政長官。

然而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九日意外的事情發生了，當時陳祖康正跟王丙鏞、任西萍等人在「浙東學會」打麻將，上午十一點兩位日本憲兵竟押著「滬二區」的余會計至「浙東學會」詢問陳等是否認識，原來該會計告訴日憲兵當地有「滬二區」之電台，陳等答不認識後，大約日人認為該會計胡說，於是兩名日本憲兵挾持余會計悻悻而去。區會計此等怪異行徑其實是來向區長通風報信的，不久滬二區人員多人被捕，滬二區面臨被全面破獲之危機，陳等人立刻會意且於下午離開「浙東學會」，陳緊急與副區長姜紹誠、任西萍商量應付辦法，後陳躲至徐天深寓所，不敢出門，不久決定請陳公博幫忙，當時汪精衛已死，陳公博為代理主席，陳答應幫忙且因陳知道周佛海已與重慶搭上關係於是亦知會周佛海，姜紹誠亦派

⁴⁹ 費雲文編纂，《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台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10月初版)，頁110。

⁵⁰ 宋廷琛，〈回憶敵偽期間軍統局上海站一段往事〉，《傳記文學》，第42卷第3期，民國80年2月，頁113。作者為陳祖康之妻舅，當時亦服務於「滬二區」。

⁵¹ 陳祖康，〈青燈夜雨憶前塵(一)〉，《中外雜誌》，第20卷第1期，民國65年7月，頁60-66。

⁵² 陳祖康，〈青燈夜雨憶前塵(二)〉，《中外雜誌》，第20卷第2期，民國65年8月，頁75。

任西萍求助於周佛海(任西萍是戴笠安排於「滬二區」策反其兄任援道的)⁵³，後來陳公博告訴日人陳祖康是他的「東機關長」，是要與重慶進行和談的管道之一，得到陳公博及周佛海的掩護，於是「滬二區」被捕人員通通被釋放⁵⁴。

其實汪方打擊渝方地下組織的行動還擴及其他地區，除了江蘇及上海地區之外，汪政府亦曾在廣東省汕頭市破獲重慶方面重要的地下組織，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下午四時汪方汕頭市政府在澄海縣金沙鄉破獲渝方「軍委會參謀本部特務工作團韶關站揭陽分站汕頭組」，該組織的領導人爲李伯榆及李伯秋，李伯秋爲澄海人，被捕時年二十五歲，三年前其族姪李伯榆由重慶歸來稱其奉重慶「軍委會」而來，李伯榆請李伯秋加入其組織並介紹工作人員，於是成立該工作團，由李伯榆任組長，李伯秋及其所介紹人員爲行動組員，該組織又成立了四個班，計「執行班」專任暗殺爆炸及恐怖行爲，由李伯榆兼任，李時耀負責。「行動班」調查政治、軍事、交通各種情報，由余麟、楊敏及李伯秋負責，「保管班」由李伯秋兼任，「掩護班」由劉木負責。該組織成立後也對汪日執行過多起破壞行動，民國三十年九月十八日在汕頭市「中央酒店」發生的炸彈案，乃由李伯榆及李時耀所爲，民國三十一年舊曆二月二十一日，李伯榆開槍擊斃日軍警備隊密偵。

汪方汕頭市政府先逮捕李伯秋，再於李伯秋家中搜出李伯榆寄給李伯秋之函，其中還附炸藥信藥五枚，接下來於李住處找到紅色炸藥一埕、棍形炸砲七塊、用紙包裹竹筒形炸配砲三十條、雷管五枚、毒藥一樽。汪方再循線逮捕趙姨媽、郭立順、楊敏、余麟、李璧欽他們都擔任情報及搜集任務⁵⁵。

重慶方面在上海等地的組織不斷被破壞，到後來代表組織部的「統一委員會」及「軍統」的上海區都被破壞殆盡，特工首領如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王天木、陳恭澍、陳祖康等人逃的逃、躲的躲、投降的投降，汪方「七十六號」對這些特務組織的打擊算是很成功的，然而戰爭末期日軍敗象漸露，汪方人員不斷尋覓重慶路線，巴結渝方人員，因而渝方組織雖多已破滅但對渝方而言影響應不算太大。

三、八百孤軍、租界俘虜

汪方對待渝方留存上海的一切勢力，採取非降即消滅的策略，當時退守公共

⁵³ 周佛海民國 33 年 7 月 20 日日記：「任西萍來，談渠之情報組織被破獲，請予救援，當約公博詳商，渠亦贊同，擬一切不變，仍與內地通電，惟恐內地知有變故，對此台不加信任耳。」見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1047。

⁵⁴ 陳祖康，〈陳公博一段秘辛〉，《中外雜誌》，第 19 卷第 5 期，民國 65 年 5 月號，頁 43-44

⁵⁵ 〈廣東偽組織關於汕市府破獲抗敵組織案卷〉，《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類 715.1 號 284。

租界的八百孤軍遂亦成爲汪方下手的目標。謝晉元，字中民，廣東蕉嶺縣人，生於民國前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九二四年考進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畢業後即歷任軍職，自排、連、營長、參謀主任至團長⁵⁶。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戰爭爆發，謝所部爲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五二四團，該師師長爲孫元良，謝擔任團長，戰爭爆發後謝部由原來駐防地江蘇無錫調至上海閘北車站一帶⁵⁷。「八一三淞滬戰役」發生後謝堅守陣地達數月之久，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晨日軍突破「大場防線」，中國軍隊奉命後撤，謝部擔任掩護退卻任務，不久閘北火車站也被日軍佔領，十一月一日拂曉，統帥部下令撤退至公共租界，謝晉元團八百多人在英軍掩護下進駐「四行倉庫」⁵⁸，所謂「四行倉庫」即當時金城、鹽業、大陸、中南四銀行之聯營倉庫，爲兩棟六層樓的鋼筋建築，原爲謝部所屬第八十八師之司令部⁵⁹。「四行倉庫」的西邊和北邊都是中國地界，但皆已被日軍佔領，東邊是西藏路，屬於公共租界，南邊是蘇州河，過河即是公共租界，所以「四行倉庫」事實上成爲孤島⁶⁰。

謝部退到四行倉庫後，上海市商會主席王曉籟請「崇實女校」女童軍楊惠敏冒險游過蘇州河，爲「孤軍團」送來一面國旗並將之升上倉庫高點，鼓舞上海的民心士氣⁶¹。滬市民衆，聞風前來瞻仰者，途爲之塞，親攜慰勞品交負責機關設法送入慰勞者，爲數甚眾⁶²。謝晉元部進駐「四行倉庫」後三面均受日軍環伺攻擊，日軍陸海空軍之砲火震天，上海市民均爲之擔心，謝部雖仍堅守不屈，但租界領事團卻深恐戰局拖延不決，有礙租界治安，尤恐日軍砲火波及租界，於是租界當局要求中國政府命令「八百壯士」退入租界，由租界當局以中立地位，擔任安全與給養，國際婦女界及中華婦女同盟會亦向蔣夫人陳情，希望四行孤軍早日撤離⁶³，最後中國政府同意，於是十月三十日拂曉，謝部在英軍掩護下退出四行

⁵⁶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33)－謝晉元〉《傳記文學》，第 28 卷第 3 期，民國 65 年 3 月號，頁 113。

⁵⁷ 楊惠敏，〈向四行倉庫守軍獻旗經過〉，《掌故月刊》，第 52 期，頁 37。

⁵⁸ 孫元良原著，〈四行孤軍－八百壯士〉《傳記文學》，第 21 卷第 6 期，民國 61 年 12 月，頁 15。

⁵⁹ 丘式如，〈謝晉元與八百壯士〉，《中外雜誌》，第 19 卷，第 1 期，頁 90。

⁶⁰ 鄭俠飛，〈謝晉元團長與八百壯士〉，《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總第 32 輯，頁 72-73。作者當時服務於公共租界「萬國商團華隊」，萬國商團是外國人成立的保護租界的武裝組織，有英國隊、美國隊、日本隊、華隊等，當時「華隊」曾協助謝部退入公共租界，作者後又成爲謝之翻譯官，擔任謝與英軍溝通之任務，還曾入孤軍見到送國旗的楊惠敏，故對當時「孤軍團」的經過頗爲瞭解，詳見該文。

⁶¹ 楊惠敏，〈向四行倉庫守軍獻旗經過〉，《掌故月刊》，第 52 期，頁 37-38。

⁶² 〈孤軍奮戰記〉《良友畫報》，第 132 期，1937 年 12 月號，頁 14。

⁶³ 姚曉天，《上海的守護神－謝晉元傳》，(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71 年 11 月 30 日初版)，頁 214。該書訪問了謝之親友又參考了謝之日記，故可信度極高。

倉庫並進入公共租界膠州路英國兵營駐紮⁶⁴。然謝部進入公共租界後被解除武裝，並由萬國商團「白俄隊」擔任監視任務，謝部團員僅能在該軍營鐵絲網範圍內活動，來往人員須先經「白俄隊」的登記管制，故該地形同俘虜營，但中國人稱之「孤軍營」⁶⁵。

謝團長以為撤退到租界後，即可向撤至滬西的原八十八師歸隊，謝曾說：「當余等奉令撤退時，滿以為即可通過租界，向滬西歸隊，不料實出意想之外」⁶⁶，退入租界的「孤軍」不僅武器被沒收，還遭監視形同軟禁，這樣的結果令謝十分痛苦，民國二十七年八月，謝向工部局交涉要在營內掛國旗，租界當局擔心日方抗議乃予拒絕，但謝不予理會仍舉行升旗，於是萬國商團「白俄隊」衝擊孤軍團搶奪國旗，造成謝部四人死亡，百人受傷⁶⁷。對於「孤軍團」的處境，重慶方面透過市黨部地下工作人員的聯繫都非常清楚，渝方還能指揮著「孤軍團」，並繼續發給軍費。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蔣伯誠及吳開先曾為「孤軍團」請命，他們稱擬在年終歲末之際以金錢慰問「孤軍團」，該電稱：「四行孤軍在滬二年，中樞從未派員慰問，茲擬撥款兩萬元，以五千元發孤軍，代總裁前往慰問 藉示中央眷念之意，是否有當，敬請核示為禱」⁶⁸。十二月二十五日吳紹澍再電重慶請求向工部局交涉釋放謝晉元部，該電稱：

四行孤軍被扣在滬，瞬將三載，反動及不良份子時加引誘，惟該軍在謝團長領導下，意志堅定，除由本處開辦補習學校每日予以積極聯絡外，擬請中央在外交方面與租界當局力予交涉，設法釋放，不然在精神上擬時予安慰，以資鼓勵，俾免外界引誘⁶⁹。

汪精衛一伙人於二十八年五月來到上海，「孤軍團」也是他們極力爭取的對象，蔣伯誠、吳開先、吳紹澍等人擔心汪精衛對「孤軍團」的威脅利誘故請重慶交涉釋放謝部，否則亦應慰問之安定其軍心，避免汪方乘虛而入。

十二月二十六日蔣伯誠及吳開先接到情報汪精衛有接收孤軍改編為汪軍之舉，於是再電重慶希望多注意孤軍⁷⁰。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吳紹澍代謝晉元轉呈蔣

⁶⁴ 丘式如，〈謝晉元與八百壯士〉，《中外雜誌》，第 19 卷，第 1 期，頁 92。

⁶⁵ 鄭俠飛，〈謝晉元團長與八百壯士〉，《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總第 32 輯，頁 76-81。

⁶⁶ 謝晉元，〈我們的生活—四行倉庫孤軍之生活〉，《良友畫報》，第 139 期，民國 28 年 2 月號，頁 20。該文為謝當時於畫報上所發表。

⁶⁷ 凌維城，〈懷念抗日英雄謝晉元〉，《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總第 32 輯，頁 67。凌維城是謝晉元之妻。

⁶⁸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2 月 13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⁶⁹ 〈吳紹澍電朱家驊葉楚傖—民國 28 年 12 月 25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⁷⁰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2 月 16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委員長一電，由該電可知謝部自進入「孤軍營」無刻不在設法脫離租界，無奈重慶方面不知何因一直未予協助，該電稱：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鈞鑒(一)南市撤入法租界之軍警保各部，原達七千，現剩餘一千三百五十名分駐兩處，據確訊將併駐一處，須保釋四百，近日已釋十餘(二)前年春，法當局擬全部運安南作工，因無運費作罷，請由外部向法大使交涉全部釋放，或運安南全釋，經費由政府撥(現按月由中行撥維持費兩萬元)(三)該部為守浦東之五十五師，南市無抵抗實主管之罪，陸續保釋壯健者旅費，生擬商請黨部籌墊，由政府撥還，囑赴浙省府報到，懇轉飭准予收容之(四)前年生函工部局商自由，經領袖領事轉日領岡本，據答單提日本軍人反感極深之中國孤軍，不易解決，如能將法租界中國軍解決，孤軍問題自易辦理云，兩年來為自由呼籲，已聲嘶力竭，外部始終不加注意，懇鈞座嚴令有關係各部全力交涉法租界國軍整個自由，當否乞裁奪，謹聞，生謝晉元叩敬印，職吳紹澍代發⁷¹。

該電可見當初陷在上海的不僅是謝晉元部，在法租界亦有五十五師的部隊，而謝向重慶建議若能一併處理公共租界「孤軍」及法租界的中國軍隊，或許工部局就不會因為日方之抗議而再為難「孤軍」，答應釋放他們。

對於謝的要求重慶方面沒有答應，蔣委員長僅批示同意撥下一萬元慰勞「孤軍」⁷²。四月十日上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再為謝晉元呈蔣委員長一電，該電提到汪政府成立後，對於謝晉元威脅備至，且已有汪方暴力綁架之密報，為此吳紹澍還化妝前往「孤軍營」與謝晤面請其注意。因此之故，吳建議蔣總裁批准謝晉元離滬，使其設法潛往後方，重上前線⁷³。但是蔣委員長並不同意，五月六日蔣中正經由侍從室給朱家驊一個覆電，該電稱：「謝晉元同志仍以留滬為宜，不可輕離，以免引起外交上之糾紛。」⁷⁴，朱家驊於兩天後將該電轉知吳紹澍。蔣中正表面上的理由是避免引起外交上之糾紛，大約是指工部局所承受的日本方面的壓力，會令工部局為難，但這僅是表面說法，不知重慶方面是否有其他考慮。大概是「孤軍」處境的嚴峻，於是五月十四日謝晉元再透過軍政部長何應欽等人呈蔣

⁷¹ 〈吳紹澍代謝晉元電朱部長密譯轉總裁—民國 29 年 3 月 5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由於謝曾為「黃埔軍校」學生，故「生」為其對蔣時之自稱。

⁷² 〈葉楚傖函朱家驊—民國 29 年 3 月 16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當時葉為中央黨部秘書長。

⁷³ 〈吳紹澍電朱部長呈蔣委員長—民國 29 年 4 月 10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⁷⁴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快郵代電侍從室發組織部長朱家驊—民國 29 年 5 月 6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中正一電，謝再次提出希望離開上海之議。

謝致蔣之電稱工部局待之如俘虜，利用白俄做摧殘工具已令他們忍無可忍，謝提到五月十三日下午三點，工部局竟於原來「孤軍營」鐵絲網外一層竹籬加高丈餘，謝認為此舉違背當初諾言遂將之倒毀，但「白俄隊」不甘示弱乾脆將「孤軍營」大門封鎖，隔絕交通，雙方乃形成對峙，萬國商團長還赴「孤軍營」見謝，態度甚為無禮，謝乃下令做必要之部署，於是白俄隊、意大利兵、中西探捕、日憲兵將「孤軍營」包圍，雙方僵持至晚上八點才恢復原狀，為此謝稱：「竹籬加築與否尚難逆料，萬一加築，生等勢必犧牲，已請上海民眾收屍還諸政府，歸墓抗戰無名英雄墓，此為生等志願，謹此奉聞，生謝晉元叩。」⁷⁵由謝之電文可見其壓力似乎越來越大，與工部局的關係越來越惡劣，這是否與汪方對工部局的施壓有關呢？然而重慶方面似乎沒能感受到「孤軍團」的壓力與哀嚎，五月十八日何應欽透過朱家驊回覆謝晉元，該電稱：「不可冒昧突圍，致礙邦交，仍盼耐心容忍為要。」⁷⁶重慶的回覆應該讓謝晉元失望至極。

但對於恢復自由謝並不因而氣餒，七月十四日蔣伯誠及吳開先代重慶發給「孤軍」慰問金一萬元⁷⁷，收到慰問金的謝晉元大約感受到重慶方面的關心，於是乃又燃起一線希望，隔天七月十五日謝立刻再電蔣中正要求協助離開租界。該電稱：

頃承伯誠開先兩同志送到鈞座慰勞金一萬元整，敬具領，遵即轉飭全體官兵益加奮勵，期無負垂念。溯生許身革命至今，自思尚無稍有意義工作，以報鈞座之訓誨，而慰吾父吾先母教養之恩於萬一。今值抗戰三載，情勢足知建國必須堅持抗戰國策到底，用敢懇請鈞座盡最大代價，於戰事未結束前，使生個人或全體恢復自由，藉其所能報效黨國者，或較因此為大也。⁷⁸

然而重慶還是潑了謝晉元一桶冷水，七月三十一日朱家驊致吳開先及謝晉元一個簡短覆電，該電稱：「總裁批慰勉並囑安心待時。」⁷⁹重慶似乎不想讓孤軍團離開公共租界，難道真是因為怕引起英美之為難嗎？恐怕還有其他考量。

⁷⁵〈謝晉元密譯轉驢公部長煩轉軍政部長何轉呈委員長蔣—民國 29 年 5 月 14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軍政部長何」是指何應欽。

⁷⁶〈何應欽覆謝晉元電—民國 29 年 5 月 18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⁷⁷〈蔣伯誠吳開先電驢公轉呈總裁—民國 29 年 7 月 14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蔣吳向蔣總裁報告已贈孤軍一萬元。

⁷⁸〈謝晉元電驢公轉呈委員長蔣—民國 29 年 7 月 15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⁷⁹〈朱家驊電吳開先謝晉元—民國 29 年 7 月 31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孤軍團既不能脫離租界而與「萬國商團」之對峙又越演越烈，蔣伯誠及吳開先派往孤軍營聯絡慰問的人都不得其門而入。於是到了九月為調解「孤軍」與工部局的惡劣關係，蔣伯誠及吳開先與公共租界會辦何德奎見面，蔣吳除請何德奎轉致謝晉元，勸其顧全環境、忍耐求全，免為汪日所挑撥利用之外，再請重慶蔣總裁致電慰勉⁸⁰。九月三十一日朱家驊果然轉來總裁慰問電，該電稱：「尚望忍氣負重，共同生死，不屈不撓，貫徹使命，以待根本解決，中在生一日，決不忘我官兵一日之恥辱與苦痛也。」⁸¹。這樣看來蔣是不準備讓謝部離開「孤軍營」了。十一月七日何應欽致謝晉元一電，再次表達重慶對孤軍之立場，該電要孤軍不要激生事端，無論物質上及精神上均須努力忍耐，且要求孤軍應與租界當局合作，不可輕舉妄動，予敵寇以藉口，最後要謝等靜待最後勝利之來臨⁸²。如此看來渝方是要等到對日抗戰勝利才處理「孤軍團」之問題。

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一日謝晉元再致重慶一電，但該電並非要求離開「孤軍營」，而是對渝方在上海地下工作的一些建議，謝提到「達成抗戰國策必有輕重本末之分，生意應先殲敵後誅奸，不然縱能誅千百小奸，亦不若殲數敵誅一大奸之功效也，擬懇對誅奸工作如非必要，上海暫停，兵法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況汪組織生認為始終無足重視也。」⁸³謝晉元認為汪精衛不值得重視，故上海地下工作人員的鋤奸工作意義並不大應該停止。謝對汪的看法是如此，但是汪方卻因為拉攏不到謝，已準備對其不利。其實早在民國二十八年汪日方面就用盡各種威脅利誘的方法想要拉攏謝晉元，民國二十八年的「九一八」紀念日，謝曾寫一封信給父母，謝稱其若被敵人害死該函即為其遺書，該信道：「敵人劫辱男之企圖，據最近消息，勢在必得，敵曾向租界當局要求引渡未果，但野心仍未死，聲稱不惜任何代價，必將謝團長劫到虹口，只要謝團長答應合作，任何位置均可給予云云」⁸⁴。

四、拒絕合作、團長被刺

大約是謝一直拒絕與汪日合作，使汪方失去耐性，於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即謝向重慶建議不要再對汪方實行誅奸工作後十幾天，竟傳出謝晉元被刺

⁸⁰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部長駱公請譯呈總裁蔣—民國 29 年 9 月 23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⁸¹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代電中央組織部朱部長譯轉上海謝團附晉元同志—民國 29 年 9 月 30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電文內「中」字應是蔣中正之自稱。

⁸² 〈何應欽致謝晉元電—民國 29 年 11 月 7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⁸³ 〈謝晉元電朱部長轉呈總裁—民國 30 年 4 月 11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⁸⁴ 凌維城，〈懷念抗日英雄謝晉元〉，《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總第 32 輯，頁 68。

身亡的消息，當天蔣伯誠吳開先等人立刻以電報將謝被刺的前因後果向重慶報告。蔣等人提到汪政府成立後曾派人游說謝晉元，希圖重價收買但遭拒絕，後又擬武力綁架但未成功，此後謝不僅不屈服且不時有反汪言論發表於報端，導致日汪對其仇視更深。在此情勢下，謝不僅不警覺還對各界前往慰問人士一律接見，於是其中附汪人士也獲得接近謝之機會，為此蔣伯誠等人曾警告謝要多加注意，但謝深信其為人忠厚，可對一些所謂小漢奸施以感化，於是接見如故，來往者身份漸複雜，於是汪方乃利用謝的此項弱點，乘機收買謝之下級士兵郝鼎誠、張國成、張文卿、尤效儲等四人，四月二十五日四人利用早晨五點出操時，乘大隊在操場跑步之機會故意落後，趁機行刺跑步中的謝晉元，謝因身中要害當場死亡，營長上官志標及士兵數人因與叛徒格鬥而受傷，但兇手四人亦當場被捕。蔣伯誠及吳開先向重慶要求電滬工部局查明真相，「將敵偽之殘酷毒謀暴露於世，以彰其罪」⁸⁵。

謝晉元被刺身亡的消息震驚全國，朱家驊、何應欽等均致電慰問謝父謝家香及謝妻凌維城⁸⁶。四月二十五日，謝之遺體舉行棺殮儀式，前往弔唁者在六萬人以上⁸⁷，素車白馬，途為之塞，各界人士籌備舉行盛大追悼會，被日方阻止，通過談判，日方限制弔客不得超過三百人⁸⁸。蔣委員長於四月二十八日發電弔唁謝晉元，國民政府明令追贈謝為陸軍少將，命葬其遺骸於上海孤軍營內，並對其遺屬優予撫卹⁸⁹。五月六日朱家驊再發一電予上官志標，慰問其腰傷⁹⁰。謝之被刺按渝方地下工作人員之說法為汪方所為，按常理推斷也僅有汪日嫌疑最大，對於渝方而言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已傳為佳話甚至成為神話，應該深具鼓舞人心之作用，為重慶宣傳之利器，或許這也正是重慶方面不願讓孤軍團離開租界的另一個原因吧，然而謝晉元不僅不讓汪政府收編，還在報端批評汪政府，這些卻是導致汪方殺害他的重要原因⁹¹。

雖然謝晉元已犧牲，但重慶對「孤軍團」留駐租界的想法仍不動搖，謝死後由雷雄繼任為團長，雷雄仍透過市黨部與重慶聯繫著，十月十八日雷團長曾託吳

⁸⁵ 〈蔣伯誠等電朱部長驩公轉呈總裁—民國30年4月25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⁸⁶ 〈朱家驊唁謝晉元家屬—民國30年4月25日〉、〈何應欽致唁謝晉元家屬電—民國30年5月1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⁸⁷ 凌維城，〈懷念抗日英雄謝晉元〉，《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總第32輯，頁69。

⁸⁸ 陶菊隱，《孤島見聞—抗戰時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一版），頁91。

⁸⁹ 丘式如，〈謝晉元與八百壯士〉，《中外雜誌》，第19卷，第1期，頁93。

⁹⁰ 〈朱家驊致上官志標—民國30年5月6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⁹¹ 另有一說是日本特務機關所為。見朱聲昌，〈井上公館和特務機關的內幕〉《文史資料選輯》，總第91輯，頁225。該文稱日「特高課」挑撥收買謝之部下，對謝進行暗殺。

開先致電重慶要求增加給養費五千元，並要求發下新的軍毯及軍服、軍襪⁹²。月底蔣中正批示同意增加給養費五千元，但軍毯、軍服等請吳開先由市黨部經費先行墊付⁹³，此後雙方函電不輟。但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立即進佔公共租界，「孤軍團」外圍原來負監視任務之「白俄團」撤離，改由日軍駐守，發生這種變局「孤軍團」已成甕中捉鱉了，十二月十日早晨雷團長派員見吳開先商量如何應付，吳開先告以日軍如何接收警衛工作，「孤軍團」不必理會，但若日軍要收編「孤軍團」則應予拒絕，全體官兵絕不可接受所謂「僞命」⁹⁴。但事實上「孤軍團」已成俘虜僅能任日軍宰割，最後這群戰俘先被押赴寶山「月浦飛機場」監禁，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九日，孤軍全體再被日軍移押「新龍華唱藝所」挖戰壕。不久又被日軍押往南京珠江路老虎橋第一監獄監禁，此後日軍將孤軍團分散，五十人住南京光華門外，六十人住孝陵衛，另押解裕溪口與新幾內亞各五十人，餘則仍原處監禁。這些孤軍受盡磨難，其中有九人於抗戰期中即逃回重慶，而在被押解至南洋新幾內亞做苦工之五十人中，抗戰勝利後有三十六人由澳洲政府派艦送回，其餘則不知所終⁹⁵。

重慶一直不讓「孤軍團」離開上海一定有其戰略考慮，而對汪日方面而言，租界中存在著渝方軍隊對他們不啻如芒刺在背，難保那一天情勢不同時他們不會由租界出動來突襲日軍。以此之故，汪方勢必要瓦解這支意志堅強且還具宣傳作用的軍隊，他們先以收編的方式來引誘孤軍投汪，這在給養已經陷入困難的「孤軍團」而言頗具誘惑，然而孤軍畢竟仍透過市黨部秉命於重慶，民族英雄謝團長及「八百壯士」亦非浪得虛名，他們不可能被汪精衛所誘惑，於是在籠絡不成而謝又不斷發表批汪言論之下，汪方乃選擇除掉謝晉元。在渝方而言或許重慶以為埋一支軍隊在上海租界中，對以後收復上海有助益，但萬沒料到「太平洋戰爭」會真的爆發，於是這就造成「孤軍團」的悲慘結局，「八百壯士」雖然萬古流芳，傳誦後代，但是聲名的背後卻是甚多的不堪與令人不忍，汪方暗殺的手段雖然殘忍，但國府不准撤退的決定亦是同樣不人道，但是那樣的年代類似這樣為了國家而被犧牲掉的例子又豈只是「八百壯士」？汪方殺害謝晉元原本應是希望孤軍團能就範，從此投靠汪政府或者瓦解整個孤軍團，但是顯然這個目的須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才達成，不過當時才收服孤軍團亦已無多大意義，因為日軍已能控制整

⁹² 〈吳開先電朱部長駱公—民國30年10月18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⁹³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代電侍從室致組織部朱部長—民國30年10月31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⁹⁴ 〈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30年12月10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九函：四行孤軍。

⁹⁵ 丘式如，〈謝晉元與八百壯士〉，《中外雜誌》，第19卷，第1期，頁93。

個租界，而孤軍團瓦解對重慶亦無損失，因為按渝方電文中所透露，該團困守租界只是爲了等待勝利的到來，宣傳意義大於軍事意義。